

学林

# “山谷皆响”

## ——王士性的《五岳游草》

杨焘



王士性《五岳游草》之“两越总图”，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

晚明文士对跋山涉水、搜奇揽胜格外热衷痴迷。其中有些人更是饶有兴致地对地质风貌、建置沿革、风土人情等相关情况加以探究和梳理，王士性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

崇禎十一年（1638）岁末，晚明旅行家徐霞客远赴云南鸡足山，在兴致勃勃地探访山中胜景时，留意到“天台王十岳性究副诗、偶偶壁间”，一旁虽有各类题字，在他看来却不免“效顰”之讥（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五》）。由于应邀修《鸡足山志》，次年九月他又回到这里勘察地形，认为“王十岳游记以圣峰为中文，误矣”（同书《滇游日记十三》），对其结论提出异议。尽管双方意见相左，但也足见徐霞客对其著述相当熟悉。这位被频频提到的“王十岳”，就是稍早的另一位地理学家王士性。王士性（1546—1598），字恒叔，台州府临海县（今浙江省临海市）人。因为性喜登山临水，他在数十年间遍游天下，并撰写了大量游记和诗作，最终汇编为《五岳游草》。令徐霞客印象深刻的那一诗一偈，以及他对地貌山势的判断，就见于该书卷七《游鸡足山记》。

晚明文士对跋山涉水、搜奇揽胜格外热衷痴迷。卓明卿夸耀说：“余性癖好名山大川，两浙形胜，车辙马迹且遍。”（《东天日记》）谢肇淛更是自诩：“平生丘壑姿，适性在云水。到处逢名山，欢若遇知己。”（《小岩洞》）许多人都与此相似，不仅嗜游成癖，还将山水引为可以互通衷曲的知音。诗家墨客与山川物色的遇合，推动纪游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有些人在漫游时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游记或诗作，巨细靡遗地记录下自己的行程和观感。还有些人更是饶有兴致地对地质风貌、建置沿革、风土人情等相关情况加以探究和梳理，王士性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在纂辑完《五岳游草》后，他又先后撰著《广游志》（原题为《杂志》，附刻于《五岳游草》后）和《广志绎》，深入研讨了各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。

毋庸讳言，相较于《广游志》和《广志绎》，今人对《五岳游草》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。其实这三部著作前后承接，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。王士性之所以能在地理学诸多领域提出系统而精辟的见解，和多年来实地考察所获得的大量感性认知息息相关。即便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衡量，《五岳游草》也堪称晚明纪游文学中别具一格的大著作。其友人胡应麟就盛赞，“读《五岳游草》，觉抚琴动操之余，山谷皆响”，甚至希望“同蜡双屐”（《报王恒叔》），能够追随其后，畅游天下。

仔细寻绎王士性撰作、编订《五岳游草》的经过，如下数端尤其值得注意。首先是作者游踪广阔辽远且不畏艰险。晚明文士普遍喜好出游，可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，往往更偏爱选择一些出行便利且耗费无多的地方。杨循吉便坦言，“今吴人之所恒游者，特其至近人迹者耳。至于幽僻奇绝之境，固莫至也”（《西山游别诗序》）。王士性身为吴越人氏，可足迹所至并不囿于江南。在明代两京、十三布政司合计十五省中，除了纳入计划的福建最终未能如愿，他在其余十四省里都有丰富的游览经历。徐霞客戏称其为“王十岳”，即谓其遍访天下名山而无一漏网。朱国禎谈起“近来士夫称善游者莫如临海王公士性”“性既好游，而天又助之，宦迹半天下”（《涌幢小品》），也对此称羨不已。

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为了寻幽探秘，王士性往往不惜亲身涉险。在与

友人交流心得时，他时常提到自己“极意冒险攀跻为快”（《寄何振卿》），“当其意得，生死可忘，吾我尽丧”（《与长卿》）。《五岳游草》中有大量记载可资印证：在华山上进退失据，“于时雾卒合，目不辨下方，第见晦冥内树杪明灭在胫间”（《华游记》）；登庐山时道路陡绝，“十步五堕，失足齿齿，凛凛不自持”（《庐山游记》）；数次游览点苍山，“幽遐怪僻，无所不搜，剔然犹惧其未罄也”（《点苍山记》）。作者身陷险境固然惊心动魄，读者也不得由随之屏气凝息。由于完全沉浸在浑然忘我的境界中，他也能领略到常人难得一睹的异象奇景：在峨眉山颠亲眼目睹“摄身光”，同行者“各自见其影，摇首动指，自相呼应”（《游峨眉山记》）；盛夏时在点苍山赏雪，“卉木植雪嶂之中乎，而葩萼常带玉屑以开”（《点苍山记》）。正如梅鼎祚所言，“即少济胜之具者，亦卧游其中”（《答王恒叔叔脚》）。普通读者即使无法身履其境，也能凭借这些鲜活生动的叙述神游冥想。

其次是收录诗文各体俱备且风格多样。纪游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，从文体角度考察，原本隐隐含有诗、文两条发展轨迹。李夷仲曾将其源头分别上溯至南朝诗人谢灵运和唐代古文家柳宗元，认为二者分途并进，“诗自诗，文自文，各擅其长，不能兼也”，可到了明代却有大批文士“可谓诗文兼擅”（《礼白岳纪序》），王士性就赫然位列其中。王世贞在为王士性诗文集撰序时，特别指出“恒叔于诗无所不精，而歌行古风尤自出人意表”“文尤能近西京，出入《史》《左》”（《王给事恒叔近稿序》）。虽不无夸饰应酬的意味，但王士性在诗、文两方面都深具造诣，应该是毫无疑问的。

《五岳游草》前七卷为游记，后三卷为诗歌，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游记部分就体裁而言又多有变化，如《入蜀记》摹仿陆游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《吴船录》而使用日记体，《点苍山记》为达到抑扬后扬的效果而借鉴主客问答的辞赋体。遣词造句虽以散文为主，却时以骈偶穿插。《吴游纪行》

中的“若其轻烟拂渚，山雨欲来，夹岸亭台，乍明乍灭”，描摹烟水迷蒙的景致，就显得摇曳多姿。由于笔下摄取的景致各异，篇章风貌也随之异彩纷呈，《岱游记》的雄奇壮阔，《西征历》的深沉朴厚，《游武林湖山六记》的清新明丽，《桂海志续》的幽深孤峭，都令人过目难忘。诗歌部分同样兼备诸体，或凭吊古迹而寄托遥深，或悠游山川而轻松明快，或酬赠友朋而深情缱绻，不拘一格而富于变化。正因为《五岳游草》内多有佳作，所以贺复徵《文章辨体汇选》、汪森《粤西诗文集》、张豫章《宋元明清四朝诗》、张联元《天台山全志》等大量总集、方志都曾加以采摭选录。

最后是全书精心整合编排且图文并茂。王士性将历年撰作的纪游诗文筛选汇编为《五岳游草》，在编纂时颇具匠心。整体上依照体裁分为诗、文两大部分，各部分又打乱游历的先后时间，重新按照五岳、大河南北、吴、越、蜀、楚、滇、粤的顺序重序编排。他晚年撰著《广志绎》，另以方輿肇略、两都、江北四省、江南诸省、西南诸省、四夷为序。尽管具体采用的标准不同，但区域化、条理化、系统化的思考方式则一以贯之。在编排这些诗文时，王士性很注意提示相互间的关联，如卷一《华游记》提到“乃为诗四章记之”，即指卷八《登天姥绝顶四首》。这就使得不同篇章遥相呼应，形成纵横勾连的关系。

晚明纪游文学发展迅速，促使读者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。何良俊就认为仅仅凭借文字形容，“终不得其面目，不若图之继素”（《四友斋丛说》卷二十八《画》）。陈邦瞻也慨叹那些纪游作品，“虽文中有画，而目前无山，赏心者犹遗恨焉”（《海内奇观引》）。这就容易令人联想到，如果为纪游作品配上相得益彰的插图，必定会更吸引读者披览欣赏。《五岳游草》在前七卷正文后就各附有数幅插图，各卷标题下还特意注明“附图若干篇”。这些插图在今人看来固然稍嫌简陋失真，在当时却格外引人瞩目。虞淳熙感叹前人“冀选胜而娱焉，然未睹图纪也”，随后就说“王恒叔太仆出人意见表”（《王给事恒叔近稿序》）。潘耒也强调其优长，在于“一著为图记，发为诗歌，刻画意象，能使万里如在目前”（《重刻五岳游草序》）。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样指出王士性“游必有图有诗，为图者记七卷、诗三卷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。王士性在整合编排时的巧思独运，最终使《五岳游草》成为一部特色鲜明的图文相辅型纪游著作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、中文系教授）

日知

# 马可·波罗和范成大的物理学观察

彭渤

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述帕米尔高原一章，被此书整理者亨利·玉尔（Henry Yule）评论为“在地理方面，为全书最有趣之一章。盖其言及当时人所不明，而经现代科学解释之现象甚明也”。

其中就提到高原上“寒冷既剧，烟火无光。所感之热不及他处，烤煮食物亦不易熟”。用现代科学来说，便是海拔高、气压小，因而燃烧不烈，水在此处沸点低，不易熟物。玉尔说：“此种物理观测，在马可·波罗以前，尚未有人为之，其后经18世纪学者索徐尔（Horace Bénédict de Saussure）和之后的洪堡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）等学者证其不误。”

实际上，更早前的南宋人对这种现象亦有详细描述，它来自著名诗人范成大。这位今天看来颇有科学精神、也颇能观察的古人，最有名的便是他在《吴船录》行纪中对“峨眉宝光”现象的生动描述，并正确认识到这完全是一种普通的虹，如同我们今日在飞机上偶尔能看到的完整彩虹。

在登海拔3000米的峨眉山的途中，范成大还描述了铅直方向上“渐高渐寒”的气温变化，十分生动，相比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之类的朴素观察深入多了。最后，他提到“山顶有泉，煮米不成饭，但碎如砂粒”，显然跟马可·波罗的观察是一样的。所不同的是，范成大还试图给出解释：“万古冰雪之汁，不能熟物，余前知之，自山下携水一缶来，财自足也。”

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这个说法令人愕然：作者认识到了（“余前知之”），观察也到位了，对比实验也做了（夹生饭最终大概是被山下的水煮熟了粥），结论却偏差甚远。

今人读及此节，可能会为其误识而感可惜。其实早在几百年前，洪堡也在此处深责马可·波罗不善观测叙述，而忘记了科学的发展，有赖于一代代人去伪存真，推进认知。《吴船录》此段描述，后代并无索徐尔、洪堡这样的读者，遂淹没在历史深处了。

# 文汇学人

第534期



# 杂货店田代屋在近代上海的国际化

李艳丽

作为日本传统艺术代表的有田烧，在1868年来到了上海。它是日本长崎老铺“田代屋”上海分号的主打商品，这家上海最早期开设的日本商店经营陶漆器及木梳、镜子等化妆用品，位于南苏州路、圆明园路交界处，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背后。

## 陶瓷杂货店的使命

1862年“千岁丸”的首航为日本输运了诸多信息，尤其是长崎。一朝明治维新，“文明开化，殖产兴业”。明治初期的主要产业是缫丝业，工艺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契机是世博会。国际上热门的美术贸易市场促进了陶瓷产业的发展，陶器成为日本出口的中心产品，至1889年左右甚至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6成（见官地英敏《近代日本の陶磁器業》，2008）。

日本最初的陶瓷是从中国引进的。事实上，著名的“濂户烧”“伊万里烧”“有田烧”“九谷烧”“柿右卫门样式”均是受到了中国宋、明、清的陶瓷技艺的重要影响。有田烧指的是佐贺县西部有田地区一带烧制的瓷器总称。自1610年起，有田瓷器生产之初便仿制了很多朝鲜式的白瓷、朝鲜风的器型、古染的中国风瓷器，逐渐地中国元素占据了主要地位。后来，随着技术及意愿的变化，待到18世纪前半成为出口欧洲的前锋时，有田烧已经脱离了对中国陶瓷的直接模仿而确立了独立性。至近代，有田烧带着日本的文化韵味来到了上海。

“千岁丸”首航之后，田代屋也来到上海考察，敏锐地察觉到上海的贸易潜力，开设了田代屋分号。它毫无疑问成为长崎乃至日本对中国陶瓷贸易的一个窗口。对于上海这个重要的市场，日本政府针对陶瓷业，从需

求、款式、顾客群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调查。

例如在《从上海的中国人生活水平看对日本陶器器的需求情况》（见石黑秀久《清国上海陶器器业练习调查报告》，1906）中有记述：“下层社会也喜欢在桌子上摆上各种各样的食物，所以喜欢好看的器皿。因其用途众多，所以我国当在这方面加以重视，此为我国陶器器的希望。”虽说田代屋是一个杂货店，但是杂货并不是品质低下的小商品的意思，而重于日常用品的涵义。所以田代屋里有有田烧。

在经济发达的上海，尤其还有着租界的西洋人群体，以有田烧为代表的日本瓷器，显然是有市场的。并且，作为港口城市，上海市场成为通往中国其他城市的重要枢纽。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一个人口60余万的大都市。没有一家日本商人的店仅销售日本陶器器；中国商人销售日本瓷器的只有法租界内的几家；西洋商人销售日本杂货兼日本陶器器的，只有原英租界内的一家（见黑田政宪《清国商业视察复命书》，1901）。如此，以细致的区域划分、经营者国籍区分，分别考察了旧市街、公共租界大马路、小马路、四马路、虹口、虹口文路，可见：在上海的日本商店陈设的日本陶器器种类有栗田烧、濂户烧、美浓烧、九谷烧、有田烧等，主要是饮食餐具、装饰品；咖啡具主要为符合欧美人的嗜好。中国商人销售日本陶器器主要是因其符合中国人的需求，如尾张美浓的素坯上画着中国意趣的花木、人物等彩图。经由中国商人之手传入的日本陶器器，每年大约三四万两，主要是些粗制的饭碗碗小盘子等，商品多销往苏杭地区。

这些细致的调查为日本政府调整瓷器的图案设计、生产工艺及出口计划提供了重要指南。明治中期以后，日本对中国的陶器器出口额远超过欧美出口额。1882年向中国出口的陶器

器已超76000日元，约占全年陶器器出口额的13%，五年后的1887年，该金额超过了385000日元，中国成为日本陶器器的最大贸易国（见前崎信也《明治时代日本对中国的陶器器出口（1），2012》）。

1867年6月，佐贺藩为在中国销售陶器器及石炭，决定在上海开设佐嘉商会上海支店。而陶器器出口的鉴札（营业执照），早在1856年时已经移交于田代左卫门，这就是后来的田代屋上海分号的长崎本家掌门人。佐贺藩发展海外贸易的目的在于储备资金以进口蒸汽船、武器等装备。这才是日本富国之策的真正目的所在。

## 接待政客名流的旅馆

作为瓷器分店，田代屋在上海的经营情况可以查到的资料只有寥寥数字，似乎不是很发达，后来甚至转为煤炭经营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田代屋还兼营旅馆。

上海开埠后，客栈酒店陆续开设。1846年英国人阿斯脱豪夫·礼查建造了“礼查饭店”，这是上海第一家近代化洋式旅馆；法国人在法租界建造了“密采里”法式旅馆。“千岁丸”来访上海之时尚未有日本旅馆，日本官员只能住宿于中国人经营的客栈，随船的长崎商人和官员的随从只能宿在“千岁丸”狭小的船舱里。

1870年，上海只有日侨7人。由于早期来沪日本人中贫困者居多，住不起中国客栈和西洋旅馆，且有语言障碍，田代屋主田代源平便开了田代屋旅馆，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的类似中



▲▲ 有田烧瓷器资料图片

国客栈式的日本旅馆。据日本《东京日新闻》（1875年3月9日）记：“田代屋杂货店，经理藤原弥平。位于右英地界苏州路第一番地，客室四间，伙食费一日分，洋银七十五钱。”旅馆虽小，却是当时上海唯一的日本人经营的旅馆，除了接待普通商人外，还接待了日本政府特使和文化名人。

1873年8月20日《申报》刊广告：“代写联幅。启者本行新来一客，自号胆斋先生，系日本名士也，善书四体兼精楷。如蒙诸宝号欲写联幅者，祈请至小行面囑可也。笔资相宜，特此布闻。闰六月二十八日，大桥下东洋田代屋行告白。”

广告中的胆斋先生，即田代源平（1815—1876），日本会津人，名忠坦，字君平，号胆斋。跟随星研堂学习书法，入江户卷菱湖门下，归藩后成为藩之祐笔，是书法家。明治以后出任福岛县、文部省官职，后辞职，前往中国，与中国书画家交流颇多。因其在苏州所咏诗句极佳而被当地人称为“寒山先生”，后来据说在寒山寺内建了诗碑。胆斋在其著作《西航漫吟》中述及1873年7月渡清，与胡公

寿、吴廷康、郭传璞等画家名儒的交往轶事。

19世纪70年代，日本政府派外交特使来中国，在上海时即下榻于只有四间客房且主营杂货生意的田代屋。1884年10月22日，一批日本记者来访上海，也一同住田代屋。

这些政府要人及党派、大报的重要人员的来访，频频与不起眼的田代屋挂钩。事实上，不仅田代屋，1871年前后开设在上海的日本杂货店，如荒木屋、木棉屋、崎阳号等也兼营旅馆业务。

近代，在吸收了东西古今的情趣及工艺之后，有田烧通过田代屋来到了上海，这一“文化回流”不仅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艺术交融的途径示例；田代屋在近代新兴都市上海的经营活

动也折射出了中日经济往来贸易中的一个侧面。

（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